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合作的典型特征、风险及对策

唐廷凤 范琳琳 杨攻研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急剧增长,呈现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为主要投资主体、以能源和交通运输行业为主要目标的投资特征,地域分布极不均衡。中东欧国家存在的巨大投资需求和该地区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成为推进互利投资合作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各国的内部风险及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也日渐凸显。针对地区特征因地制宜开展精准投资合作、中国企业适时调整在该地区的投资策略以及努力构建多层次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应成为未来深化双边投资合作的政策着力点。

**【关键词】** 中东欧 中国 投资风险 投资合作 “一带一路”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ZD143);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的国际政治效应、作用机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9C10651061)。

**【作者简介】** 唐廷凤,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范琳琳,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攻研,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一 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在欧美复苏普遍乏力之际,中国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海外投资规模急剧增加,尤其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迈向新的阶段。连接欧亚大陆的中东欧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次区域合作典范,来自中国的投资源源不断流向该地区。截至2019年,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总额达到146.9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47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日趋成熟。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东欧开展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对双方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详细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合作现状、特征及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进一步深化双边投资合作的若干政策建议。

## 二 中国对中东欧投资的典型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拉开了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帷幕,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助推下,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迅速增长。2010~2019年,中国对中东欧的累计投资总额从3.1亿美元增至146.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53.4%<sup>①</sup>。2017年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正式成立,国家开发银行提供20亿欧元的开发性金融合作贷款,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二期募集资金10亿美元投向中东欧,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不断出台也预示着中国对该地区的投资未来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截至目前,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呈现如下典型特征。

第一,就投资主体而言,中国对中东欧的早期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主导。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类投资主体在该地区的累计投资总额分别为4.5亿美元、21.1亿美元和1.2亿美元。而截至2019年,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类投资主体在该地区的累计投资总额分别为36.9亿美元、50.30亿美元和59.7亿美元<sup>②</sup>。就增速而言,中央企业在2011~2014年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53%,2014年之后增长率明显放慢,2015~2019年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7.9%。地方国有企业虽然早期投资存量较高,但增速相对缓慢,2011~2014年、2014~2019年对应的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4.2%和9.9%。

<sup>①</sup> 中国全球追踪投资报告数据库(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CGIT),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sup>②</sup> 中国全球追踪投资报告数据库,其中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类投资主体的投资数据为作者通过查询微观企业的性质并加总得到,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尽管民营企业早期的投资存量低于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但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2014~2019年民营企业对该地区投资年均增速仍高达36%,即使在中央企业投资步伐明显放缓的时期,民营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地方国有企业无论是投资存量还是投资速度都远远落后于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

第二,就行业分布而言,中国在中东欧的合作项目遍布能源、运输、金融、化工、科技、娱乐和地产等行业,其中能源和化工行业最为集中,截至2019年,能源和化工行业累计投资额分别为37.6亿美元和21.1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比重分别达到25.6%和14.4%<sup>①</sup>。

第三,就行业分布的时间趋势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改变了中国投资的行业分布特征:以2012年为例,中国在中东欧化工、科技两个行业的累计投资占比高达79.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的投资多元化趋势极为明显,2019年累计投资行业排名前4名的分别为化工、能源、钢铁和运输,共计占总投资额的64.1%。上述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多以企业并购的形式实现,有记录的绿地投资仅有4笔(总额为20亿美元)。

第四,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在地域分布上呈现极度不均衡的特征。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是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累计投资额分别高达42.4亿美元和36.3亿美元,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投资总量超过了中国在中东欧投资总量的1/2<sup>②</sup>;“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塞尔维亚吸引的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累计投资额由2014年的9.7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42.4亿美元),并跃升为中国在中东欧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国。中国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投资始终处于低速增长的状态,累计投资额分别为3.5亿美元、3.1亿美元和24.7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对捷克、斯洛文尼亚、波黑和克罗地亚等国的投资不断增加,但规模仍然相对较小。而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北马其顿<sup>③</sup>、黑山和阿尔巴尼亚七国,至今仍然没有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投资项目落地。

---

① 中国全球追踪投资报告数据库,其中不同行业的投资金额为作者通过对相关行业所有项目的投资额加总得到,<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② 中国全球追踪投资报告数据库,<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③ 马其顿政府在2019年2月12日晚间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天起马其顿正式更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因此,根据上述声明,2019年2月12日前,本文使用马其顿,在此之后则使用北马其顿这一新国名。

### 三 中国与中东欧开展互利投资合作的基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中东欧经济普遍复苏乏力,各国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及该地区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意义成为双方开展互利共赢投资合作的重要基础。

#### (一) 后危机时代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后,中东欧经济发展迅猛,2007年各国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6.7%,斯洛伐克的增速甚至达到10.4%<sup>①</sup>。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2009年中东欧经济增长率跌至-6.2%,2016~2018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3%,远低于危机前的均值。落后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中东欧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主要表现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中东欧地区整体铁路里程数为6.9万公里,仅相当于德国和法国铁路里程数的总和;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等领域,多项指标均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交通设施有待全面升级;电力领域,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人均耗电量甚至不足2600千瓦时,巴尔干国家国内电力供应不足已是常态。尽管目前情况已有所改善,但多数国家仍存在“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潜力和国家竞争力。

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中东欧重启经济增长的关键<sup>②</sup>。尽管存在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种融资渠道,但中东欧国家的政府财政预算仍然是本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来源。然而,资金缺口相对较大的国家如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的警戒线,部分国家的财政赤字也超过了3%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可能使本国的债务风险不断加剧,资金短缺已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

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急剧增长,日渐成为后危机时代中东欧理想的投资合作伙伴,各国也开始寻求与中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例如,2009年匈牙利提出“向东开放”政策;2012年波兰启动“走向中国”战略;2012年塞尔维亚倡导兼顾东西方的“两扇门”外交政策;捷克也

<sup>①</sup> 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整理, <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sup>②</sup>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Wind of Change Investment in Central, Eastern and South Eastern Europe, September 2017, [http://www.eib.org/attachments/efs/economics\\_study\\_wind\\_of\\_change\\_investment\\_in\\_cesee\\_en.pdf](http://www.eib.org/attachments/efs/economics_study_wind_of_change_investment_in_cesee_en.pdf)

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稳固的经贸关系。以投资拉动消费、以互联互通促进投资及贸易便利化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诉求高度契合,借助中国资本改善基础设施有望成为破解当前中东欧经济困境的关键。

## (二) 中东欧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地位

中东欧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企业“走出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中东欧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西部毗邻欧洲发达经济体,东部与俄罗斯、乌克兰相邻,北部直通波罗的海,南部经匈牙利与中欧陆海快线对接,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区域支点。其中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处于欧洲和亚洲之间,毗邻黑海和多瑙河,货物经“丝绸之路经济带”抵达中亚、西亚后便可在两国进行中转并发往其他国家和地区;波罗的海国家拥有优质的港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五港联盟”合作更是南北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互利共赢合作,中国与中东欧可以共同建立“一带一路”沿线更繁荣的物流和贸易网络。

中国与中东欧的投资合作同样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比较优势,探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合作模式。维谢格拉德集团作为欧洲的高端制造业生产基地和物流中心,在电子产品、汽车制造、生物技术和环保设备等领域已与欧盟形成了紧密的生产网络,也是区域价值链的重要组成,与其开展基于价值链的深度合作能使中国企业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在减少传统贸易可能引发的贸易摩擦的同时,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此外,拉脱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农业发达,在海运和建设临港产业园区方面独具优势,利用“三海港区合作”倡议形成港口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园区一体化的产业发展新模式,提升双方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当前,中国与中东欧的投资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若干基础设施项目有望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典范,如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建设所确定的属地化建设方针使该项目有效对接并融入当地市场,提升了塞尔维亚基础设施的质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对外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匈塞铁路连通了中国、中欧国家、东南欧及欧洲其他地区,建成后必将大幅提高沿线各国的铁路运输能力,加强该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效弥补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板;中国与匈牙利产能合作已初具规模,而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为当地创造了可观的就业机会。在全球贸易与投资领域多边合作机制推进举步维艰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为各国开展跨区域务实合作提供了样板。

## 四 当前中国对中东欧投资的多维风险识别

通过互惠互利的中国与中东欧合作,中东欧可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融入和对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地和互利共赢的次区域合作平台,必将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联动发展和两大文明的融合,形成全新的互利共赢的世界经济治理新秩序,然而,在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抬头、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之际,这一过程也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 (一) 中东欧各国的内部风险

中东欧各国内部的政治风险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投资项目面临的首要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党派林立,政权更迭频繁,而执政联盟内部也经常因政策倾向差异发生冲突;西巴尔干各国的选举往往因选民登记问题或贿赂丑闻而难以正常进行;马其顿 2015 年爆发了自 1991 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超过两万人集会抗议政府滥用权利和腐败行为,虽然新政府已正式组建,但政权仍不稳定,社会分化将持续存在<sup>①</sup>。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波黑是多民族国家,国家内部常因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历史遗留问题发生武装冲突,如拉脱维亚的拉脱维亚族与俄罗斯族的冲突、爱沙尼亚的爱沙尼亚族与俄罗斯族的冲突、保加利亚的保加利亚族与土耳其族的冲突、北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与马其顿族的冲突以及波黑的波什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的冲突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不断。

中东欧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中东欧各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已降至危机前水平,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下降,但长期看,经济增长有再度下滑的风险<sup>②</sup>，“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各国的现实威胁。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 80%,且高度依赖德国市场,欧洲经济增速缓慢和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上述国家的对外贸易面临高度不确定性<sup>③</sup>。波

<sup>①</sup> Country Report, The Economist Group,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February 2018, p. 6, <http://country.eiu.com/>

<sup>②</sup>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entral,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 A Broadening Recovery, Regional Economic Issues, May 2017, <http://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REO/EUR/rei0517.ashx>

<sup>③</sup> 同<sup>①</sup>。

波罗的海国家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易受外贸和金融环境打击,同时地下经济、政商勾结问题导致国内腐败严重,拉脱维亚的地下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25%<sup>①</sup>。西巴尔干国家与欧元区国家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该地区更是遭受沉重打击,塞尔维亚年均增长率仅为0.4%,恶劣的营商环境和政府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阻碍着经济的长期增长<sup>②</sup>。此外,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人口流失是中东欧国家人口结构问题的根源,1992年以来,约2000万(5%)人口移出中东欧地区。2002~2016年,11个中东欧欧盟成员国的总人口减少了400万(-3.8%)<sup>③</sup>,这无疑大幅降低了中东欧各国的长期经济潜力,加剧了中国海外投资的东道国内经济风险。

## (二) 中东欧的地缘政治风险

近年来,中东欧的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加,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恶化。维谢格拉德集团由于拒绝欧盟难民配额计划引发欧盟不满,波兰和匈牙利试图控制国内媒体自由、通过司法改革削弱公共机构独立性的做法在德法看来已经严重背离欧盟的传统价值观。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恶化,2017年9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事演习再次引发紧张对峙,爱沙尼亚在距离俄罗斯边境150公里的塔帕镇加强了军事部署,波兰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联系,罗马尼亚积极支持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巴尔干地区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矛盾重重,科索沃主权归属问题引发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及波黑之间的敌对状态,保加利亚不仅不承认北马其顿国家政权的合法地位,甚至不承认马其顿民族的存在,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在皮兰湾海域存在主权争端,与黑山在普雷维拉卡半岛领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日益被“泛政治化”,并时时引发中国与欧洲政治关系的波动。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旨在加强欧亚大陆互联互通,投资项目多集

<sup>①</sup> Country Report, The Economist Group,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February 2018, p. 6, <http://country.eiu.com/>

<sup>②</sup> 同<sup>①</sup>。

<sup>③</sup> 其中45%的人口迁徙是由于中东欧国家居民移居西欧富裕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问题最为严重,自2002年以来,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口下降15%以上,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人口下降9%左右。另外,该地区下降的总人口中有390万是16~64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如波兰2017年劳动力市场缺口高达10.24万,劳动力短缺导致国内工资持续上涨,不断削弱该地区的竞争力。

中于能源和运输领域,投资主体同样以国有企业为主,加之合作协商常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进行,欧盟日渐担忧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并试图建立排他性的次区域集团对欧洲“分而治之”。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同样与欧盟的“跨欧洲铁路运输网络计划”(TEN-T)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进一步加深了欧盟的猜忌。欧盟表明未来将建立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外资对本国基建、技术方面的并购行为必须在透明、严格审查的前提下进行。中国与中东欧的产能合作也往往成为欧盟国家失业问题的替罪羊,欧盟除进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外,还联合美日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要求中国取消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方面的投资限制。针对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不断显现。此外,欧盟计划向包括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提供总额为9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交通、能源等领域,支持该地区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该地区与中国相关领域的投资合作正不断推进,中国主导的大型基建、产能等项目日渐增加,中国与欧盟在投资领域的竞争与替代效应也开始浮现。

与此同时,伴随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欧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中东欧地缘战略意义的凸显,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中东欧,以修正过去十余年忽视该地区的外交政策。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强与该地区在安全、经贸和人文等多领域的合作以强化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存在。一方面,通过“三海协议”加强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提升该地区对美国的经济依赖<sup>①</sup>;另一方面,借助北约增加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担保,不断提升双边政治关系,最终达到削弱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目的。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均与美国签署了有关5G安全的联合声明,考虑将“华为”排除在5G建设之外。同时,美国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投资力度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美国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合作的重要因素。

## 五 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合作的对策

### (一) 针对地区特征因地制宜开展精准投资合作

多样性是中东欧地区的突出特征,各国在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市场

<sup>①</sup> 贺之杲:《美国重返中东欧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

规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使得各国在利益诉求及合作要求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为进一步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提高中国海外投资效率,中国可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总体布局之下,合理规划与各国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投资项目。例如,同爱沙尼亚和捷克进行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与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共同构建高效的地区物流网络等。这可以在扭转当前中国投资的地域和行业分布失衡局面的同时,打破现有的投资合作瓶颈。同时,在美国重返中东欧之际和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可以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信息化、农林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创新合作,避开较为敏感、涉及安全议题的高科技行业领域<sup>①</sup>。此外,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中东欧有对医疗资源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急切需求,在上海、广州等医疗资源和抗疫经验丰富的地区与中东欧开展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合作同样大有可为。

为真正达到精准合作的目标,可以尝试进一步推广地方政府直接对接的模式,“只有扎根地方,才能汲取更多养分”,充分调动双方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展开多种形式的投资合作(如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地方交流合作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结对的友好省州、城市已经超过160对,宁波已正式启动建立首个“16+1”经贸合作示范区,辽宁省也在积极跟进。中国国内各地区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寻找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多的投资合作,如以装备制造业为传统优势的沈阳已经确定将工程机械、机床工具、医疗器械和输变电设备等领域作为深化与中东欧合作的突破口。中国各地方政府可依据自身的优势产业,充分发挥国内发达的跨境电商优势,尽可能避免某些国家或地区成为投资空白区。同时,对于友好城市,通过人文交流增强民众之间的信任与好感度,可有效降低投资项目推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东欧形成了多个具有明显地区特征的次区域合作平台,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组成的“波罗的海合作”,“东南欧合作进程”等,它们对于该地区的经贸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力,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与已有区域合作机制的协调和沟通同样至关重要,应寻求中国与中东欧多个次区域合作的最优切入点,尽可能避免区域内各国之间的投资竞争,扩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经济外溢效应。同时,欧盟正在进一步加强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支持

<sup>①</sup> 龙静:《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创新合作》,《欧亚经济》2020年第4期。

力度,未来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能源领域,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中国在上述领域可加强与欧盟的协调,推广佩列沙茨跨海大桥项目的经验,吸纳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减轻欧盟对中国在中东欧投资活动的疑虑。

## (二) 中国企业应适时调整在中东欧的投资策略

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为主,并且投资项目主要集中于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一方面,未来中国企业应充分尝试多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联合“走出去”的模式,探索以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为辅,以民营企业打前线、国有企业随后跟进的混合所有制海外投资模式,减少双方投资合作的潜在障碍<sup>①</sup>;另一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单独投资规模过大的项目,此类项目更容易进入外资审查的行列,加上不少中国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往往造成投资项目无法按照原计划完成的情况,而且此类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企业不得不依赖外部融资(尤其是国内金融体系的支持),双方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差异可能为投资项目带来额外的政策风险<sup>②</sup>。尤其是面对西方国家关于“债务陷阱”和“不当竞争”的指责,中国企业可尝试采取公私合作模式直接从欧盟融资和向国际市场进行融资,通过公开的方式获得欧盟的资助,以防范海外项目的投资风险。

中国企业应真正实现经营和管理的本地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主动聘用来自欧盟国家的管理团队,以有效规避欧盟对外商投资本地化经营的审查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同时,还需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以夯实双方投资合作的基础。中国河钢集团对塞尔维亚的斯梅代雷沃钢厂的收购正是由于坚持这一理念而成为中塞经济合作的典范;“中国电建”在承建弗罗茨瓦夫分洪河道整治工程时为保护生态环境所做的努力赢得了波兰的广泛赞誉,对后续中国与波兰乃至中国与中东欧其他国家的投资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多以并购形式实现,未来可以更加灵活的战略联盟等合作方式替代股权收购,采取绿地投资模式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

中国与匈牙利、塞尔维亚已经建成了多个经贸合作区,为双边投资合作

<sup>①</sup> 张明:《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注重国家风险的评估和防范》,《中国对外贸易》2017年第5期。

<sup>②</sup> 王碧珺、肖河:《哪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容易遭受政治阻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

搭建良好的公共平台,对于中国国内企业而言,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可以有效改变单个企业独自面对国外市场竞争的形势,帮助企业“集体出海、抱团取暖”,有效抵御投资风险;通过经贸合作区还可以吸引众多配套行业的企业入驻,在园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为获得规模效应创造有利条件。在境外合作区建设过程中由政府和主要企业牵头,还可以显著提高与东道国进行各项政策协调的效率。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经贸合作区以有效规避经营风险,积极拓展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合作空间。

### (三) 努力构建多层次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

多层次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中国和东道国可考虑进一步升级已有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基于“引进来”的目的与中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是协定中存在保护标准不明确、可仲裁事项的范围过窄等问题,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投资热潮。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应尽快完善有关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资金流动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相关条款,以确保各国企业能够享受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还需加快《海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进程。面对众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应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作用,明晰投资保险种类、补偿标准及承保机构的代位求偿权,确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相关保险机构对中国企业利益受损的事后补偿有法可依,真正发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过程中的“护航者”角色。此外,中国政府也可尝试借鉴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实践经验,从政府征收、政府违约、资产转移限制和战争内乱等风险担保角度创设与中东欧国家投资环境更相适应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通过再保业务和分保业务为企业的非商业性政治风险提供担保,并将其作为长效机制为企业提供稳定可靠的保障。

从长期来看,中国与中东欧还可尝试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协调机构主要由设在中国外交部的中国—中东欧合作秘书处承担,中东欧各国任命各自的国家协调员负责与秘书处的协调,共同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但尚未有专业性的投资和贸易争端解决机构。伴随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可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经验,同中东欧国家平等协商以共建公平公正、专业高效、透明便利的区域性协调机构,专门解决可能发生的各类投资争端,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双边投资合作迈向新台阶。

(责任编辑:李丹琳)